

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机制差异分析

刘冰镜 杨德才¹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板块,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是中国经济最具成长性的地区。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东北地区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市场机制差异逐渐加大。文章选取 2001—2019 年的样本数据,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政府行为、经济主体、要素市场和中介四个方面的市场化指标体系, 测度了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指数, 通过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对比, 寻找导致这种市场机制差异的内生原因。结果表明, 东北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于长三角地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市场化机制。因此, 东北地区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必须加快其市场化进程, 缩小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机制差距。

【关键词】: 市场机制差异 机制创新 东北地区 樊纲指数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22) 10-0009-07

一、引言

作为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2003—2012 年的 10 年间, 东北地区的 GDP 年平均增速达到了 12.7%, 甚至高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但在 2014—2019 年间, 辽宁省 GDP 增长率仅为 5.8%,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分别为 4.5% 和 3.5%, 位居全国倒数。曾经支撑东北老工业基地蓬勃发展的增长动力日益衰退, 原有的制度结构已不能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 东北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亟待加强。

二、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领域, 均选择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基本的理论逻辑假设, 西方经济学较少去研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因此, 西方经济学并不存在有关市场化的精确定义。国内早期对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市场化含义的界定上, 常修泽和高明华 (1998)^[1] 认为, 市场化是指“资源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化的过程”, 市场化的本质就是由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刘澈元和闫磊 (2005)^[2] 提出, 市场化对于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工具性意义, 区域治理的完整性是导致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产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有关市场化程度界定的相关问题, 学界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这也使得国内学者在对市场化进行测度时采取了不同指标——以樊纲指数和北师大指数为代表。其中, 樊纲指数主要在于分析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即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成果如何, 用于测度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是否存在进步^[3]; 北师大指数对市场化程度测度的目的在于分析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是否有进步^[4]。在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 赵文军和于津平 (2014)^[5] 从全国及地区两个层面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了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从

¹作者简介: 刘冰镜 (1994—), 女, 黑龙江绥化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经济史; 杨德才 (1965—), 男, 安徽当涂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史, 新制度经济学。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18JZD025)

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并发现沿海地区在市场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的驱动力更强。李坤望和蒋为（2015）^[6]基于动态资源配置的角度，通过中国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发现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速度起到明显的正向作用。周超（2016）^[7]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开放程度越高，经济自由也就越明显，进而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张云等（2017）^[8]则认为，市场化程度的深化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江胜名等（2017）^[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调解下能够自发地进行流动以及合理配置，因而其产业结构也就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进行优化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各地区的市场经济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东北地区作为曾经的全国主要资源供应地和重工业生产基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逐渐滞后。可以说，市场化程度低是制约东北经济增长、使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主要因素。

三、市场化指数体系的构建及测算

当前，关于市场化程度测定方法的主流研究较多，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10]认为，市场化总体上涵盖了投资、价格、生产与商业等方面，通过加权法将这四个市场化特征指标合并为一个总体的市场化指数，以此来测定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这套指标体系可以说奠定了市场化指标体系的典型范式。江晓薇和宋红旭（1995）^[11]也沿用了这套基本范式，并在其基础上添加了一项关于企业十四项自主经营权的新指标，为之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顾海兵（1995）^[12]提出了关于劳动力市场、资金、生产、价格的测度指标体系的新维度，并以此市场化指数为基础重新划分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陈宗胜等（1999）^[13]通过体制、产业、区域和总体四项市场化指标测算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但是，由于市场化涵盖的范围较广，试图找到一套较为完善的能够反映全国市场化进程的测算指标体系仍比较困难。因此，樊纲等（2001）^[14]构建了一套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的五个指标维度，测度了中国 31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并对不同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为中国的区域市场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理论框架。

事实上，市场化程度既可以对过程进行测算，也可以对结果进行测算，这也恰好与樊纲指数及北师大指数相对应。如上文所述，樊纲指数的研究重点在于测度市场化过程—中国各地区当下的市场化程度与以前相比是否有明显提高；北师大指数的研究重点则在于测度市场化结果—中国各地区当下的市场化程度与标准的市场化体制相比是否有明显提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区域之间市场化程度存在的差异，并寻找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显然，樊纲指数更符合本文的研究界定，因此，本文将沿用樊纲指数的相关设定。同时，综合考量指标一致性、数据可得性、分值可比性、发展阶段适用性等限制因素，对数据进行搜集与筛选工作，参考已有研究^[15,16]，本文最终选取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13 个三级指标来构建区域比较分析的市场化指标体系。

在指标的量值计算方面，以 2001 年原始数据为基准进行测算^[17]。将表现最好的地区赋值为 10，表现最差的地区赋值为 0，然后根据每个地区每年在基期年份的指标值确定其得分。依据指数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的理论关系，计算指数的公式可分为以下两类：

$$V_i = \frac{V_i - V_{\min(0)}}{V_{\max(0)} - V_{\min(0)}} \times 10$$

当指数对应的原始数值与市场化程度正相关时，称其为正指数：

$$V_i = \frac{V_{\max(0)} - V_i}{V_{\max(0)} - V_{\min(0)}} \times 100$$

当指数对应的原始数值与市场化程度负相关时，称其为负指数：

其中： V_i 为某地区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V_{\max(0)}$ 为6个地区在基期年份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中最大值； $V_{\min(0)}$ 为最小值。

本文选取2001—2019年的样本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工商银行年鉴》、各大银行统计年鉴及年报、中经网数据库等。

评价目标包括东北地区及长三角地区（特指传统意义上的苏浙沪地区），由于上海市为直辖市，为保持指标一致性，将指标的统计口径设定为省级：长三角地区中选取江苏省和浙江省；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与长三角地区甚至是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地区在经济基础、体制转型以及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这也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颇具解释力的中间机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果，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尤其是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制约了东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市场化进程的差距呢？下面将通过上文构建的市场化进程测量指标体系，将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差异进行对比，并找到造成这种市场机制差异的内生原因。

四、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市场化进程现状的比较分析

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导致市场很难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其陷入一种“体制困局”^[18]。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基础导致其大多行业是资本密集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依靠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压低生产成本，以计划和配置的方式指导这些重工业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程度的深化，投入要素和产品价格日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企业缺乏自主性的问题逐渐显现，愈发难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企业效率较低。东北地区难以摆脱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市场化程度较低，由于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旧观念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数据不仅反映了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的差距，更是反映出两个区域间市场机制的差距。东北地区的市场机制环境相对于长三角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长三角地区产权界定日渐清晰，市场职能日趋完善，其传统的社会秩序在新制度安排的冲击下逐渐被打破，地方政府与公众都乐意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市场经济。然而，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的形成滞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压力较大，这些都是东北经济在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在市场化总指标方面：以2019年为例，东北地区不仅较全国平均水平低0.18，更比长三角地区低1.92。其中差距最大的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水平，较长三角地区低5.21；其次是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水平，较长三角地区低3.74；再次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水平，较长三角地区低2.58；差距最小的是市场中介，反而较长三角地区高3.87。

在分项指标方面：第一，政府行为方面的差异。以2019年为例，东北地区的政府行为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是1.49，与长三角地区的差距是5.21。这种差异是由于东北地区受到历史遗留因素影响，导致其集体性或公共性的资本大部分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积累起来的，具有计划经济时期特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政府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社会财富与经济效益之间产生冲突，导致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产生了市场机制差距。

第二，经济主体方面的差异。2019年东北地区的经济主体指标与全国的差距是1.05，与长三角的差距是3.74。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对国企体制具有强依赖性，这些老牌国企由于历史原因，面临着长期亏损、产能落后而无法满足市场

经济发展需求的困境，难以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企业竞争。东北地区的很多企业投资主体单一，进行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难度比较大，这些因素都导致东北地区全面振兴道路难度较大。

第三，生产要素方面的差异。2019年东北地区的要素市场指标与全国的差距是0.77，与长三角的差距是2.58。这表明东北地区的资本、劳动、技术和土地等要素资源的市场化改革落后于长三角地区。事实上，要素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及使用效率可以推动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化。东北地区目前处于要素投入数量存在浪费、要素组合效率较为低下的状况，一方面，东北原来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适应粗放型生产的劳动力却不一定适应集约型生产，这也是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之一。

第四，市场中介方面的差异。2019年东北地区的市场中介指标较全国高出2.60，比长三角地区高3.87，是4个分项指标中唯一高出的一项。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市场经济秩序仍需规范和整顿。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往往要比国有企业高，这是导致东北地区市场经济水平难以与长三角地区比肩的重要原因。东北地区若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市场机制差距，关键在于要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此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直到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之后，市场化差距才有所下降。东北地区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在2004年，变化趋势表现为2004年之前差距逐步扩大，2004年之后差距逐步缩小，且缩小的幅度明显大于扩大的幅度，至2016年总差距更是下降到0.02。然而，2019年总指标的差距又扩大至0.18，这也反映了国家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需进一步持续推进。

五、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产生市场机制差异的原因分析

诺思提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9]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与制约来最终决定经济绩效。可以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专用性”，制度短缺无法用其他要素替代。因此，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机制，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组合并优化其配置。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依赖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基础上，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事实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效益的差距主要是经济运行制度的差距。

东北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于长三角地区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市场化机制创新。Huang和Yang也提出：“制度决定试验的费用，因而决定了生产力水平。各种制度或组织在相互竞争中，或以占优的制度替代劣势制度，或相互吸收优点以实现制度改进，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制度创新。”^[20]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其实也就是机制变迁缓慢。虽然，东北地区自然禀赋优越，也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这些资源禀赋优势尚未进一步转化为市场优势，缺少能把潜在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变成现实经济优势的环境，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比较缓慢。而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能积极推动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活动，使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及经济效益都比较高。因此，东北地区缺乏市场机制创新是其市场化程度较低、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产生市场机制差异的本质原因。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路径依赖效应导致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东北地区早年的各种产业主要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并未充分考虑东北地区内部产业的关联性，近些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行业多数是投资大、周期长的产业，在短期内很难调整。而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甚至有完整的区内产业集聚配套体系。因此，东北地区除了受到既定产业布局的影响外，其重工业的上游性、原料性、粗加工性等特点，与长三角地区产业的下游性、终端性、精加工性等特点相比，其附加值较低、产业链也更短，进而导致其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加大。

其次，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市场环境意识较弱。由于历史原因，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相比，其市场意识、市场培育等方面都尚需完善。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当地居民习惯性地依赖政府，将生存保障、生活需求以及就业机会等希望更多地依托在当地政府身上。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人们进行自主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东北地区社会创新创业意识较为薄弱。

最后，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基础薄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传统经济特色使得东北地区尚未形成良好的民营经济环境。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东北地区也尚未形成以自由市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模式，原有的“产业孤岛现象”也尚需尽快进行调整。东北地区长期较为单一的经济氛围导致其市场化基础较弱，对风险投资人的吸引力也较弱。因此，东北地区的市场经济改革进展比较缓慢，机制创新的步伐也较为迟缓，使东北地区的市场机制与长三角地区的差距逐渐加大。

六、结论与建议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东北地区由于其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时间相对较长，因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难度较大，其增量的市场经济发展较为迟缓，市场化进程也更加缓慢。与此相对应的是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其增量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然更加快速，市场化进程也更加迅速。因此，东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市场机制差异逐渐拉大。综上，本研究具体结论如下：

其一，“老工业基地社会是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制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为相关社会群体认同的习惯社会。”^[21]因而，这种由路径依赖导致的生活习惯、组织认同、社会认同感仍会长期存在^[22]，加大了向市场经济转换的难度，使得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支柱性产业发展和创新动力不足。而长三角地区之所以能依靠市场经济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产业链更加明晰，进而能够产生较大的激励作用。

其二，东北地区整体的市场活力不足，地方政府的市場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应清晰界定权责范围。但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会存在一定的交叉现象，导致其主导性较强，服务意识较薄弱，进一步导致企业更加依赖地方政府，自主性和创新性相对降低，缺少一个充满活力的营商环境，从而使市场化进程缓慢。而长三角地区的市场自由竞争空间更大，从而导致两区域间的市场机制差距加大。

其三，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当前，东北国企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动力不足，缺少较为有效的激励效应。民营经济之所以有效率，就是因为它将个人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使激励相容，进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而东北地区缺少强激励效应，因而很难发展对激励相容性要求更高的民营经济，从而难以提高经济效率。与之相对，长三角地区的民营经济效率更高，市场主体活力更强，使得两者间的市场机制差异逐渐加大。

事实上，有效的机制安排不仅可以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更可以加速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而无效的机制安排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东北地区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重视机制创新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克服其市场化进程中的机制束缚。因此，只有通过机制创新才能加快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据此，本文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中央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对东北地区的一体化建设进行因地制宜地规划，制度切实可行的各行政区间协同发展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市场化改革的质量，加速推进东北的市场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9月28日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明确指出：“实践证明，党中央做出的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是正确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前景是广阔的。”因此，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仍需要中央政府加强统筹引导、重点扶持，以东北的基础产业结构为依托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要破除体制障碍以及地域性分割的制约，建设东北地区的自体产业园区和工业聚集区，实现跨越行政区域优化配置产业格局并有效延伸产业链的目标。在第三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东北地区作为典型的资源衰竭型城市 and 老工业城市，必须进行功能的转换，扩充市场容量，提高市场化质量，从而有效遏制由城市衰退导致的市场萎缩。

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明确职能，变“主导”为“引导”，增强市场服务意识。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抓住改革开放机遇，

大力发展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而东北地区由于一直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着“压舱石”的角色，使得东北地区较少给出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东北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需加速适应并融入市场化改革的新定位和新层次，推动东北地区市场经济的有序新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17 日在辽宁考察时讲话的精神：“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市场服务意识，要以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推动法治建设为基础，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构筑一个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

最后，国有企业必须推进市场化的人事制度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在东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讲话：“东北振兴的关键是人才，要研究更具吸引力的措施，使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重要城市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考虑现阶段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滞后，对优秀管理人才的吸引力也较弱，因而东北地区国企更适合“就地取材”，优先开发企业内部的人才，将企业中具有管理才能的员工选拔到管理层，循序渐进地再逐步举办开放式的竞聘活动。因此，国企需提升其内部的人才密度、资本密度、创新密度，以此缩小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市场化差距，完成与发达地区市场的有效对接。

参考文献:

- [1]常修泽, 高明华. 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J]. 经济研究, 1998(11):48-55.
- [2]刘澈元, 闫磊. 区域市场化测度意义与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对国内市场化研究之述评[J]. 生产力研究, 2005(1):223-231.
- [3]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等.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3):9-18.
- [4]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 2003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 [5]赵 00 文 3. 军, 于津平. 市场化进程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4(3):3-22.
- [6]李坤望, 蒋为. 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15(5):48-60.
- [7]周超. 经济增长、市场化程度与产业结构的区域性差异[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12):117-120.
- [8]张云, 赵富森, 仲伟冰. 市场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影响的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J]. 工业技术经济, 2017(12):114-121.
- [9]江胜名, 江三良, 吴石英. 市场化、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2):81-90.
- [10]卢中原, 胡按钢. 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 经济研究, 1993(12):49-55.
- [11]江晓薇, 宋红旭. 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 管理世界, 1995(6):33-37.
- [12]顾海兵.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判断[J]. 改革, 1995(1):85-87.
- [13]陈宗胜, 吴浙, 谢思全.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52-79.

-
- [14]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2000 年报告[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3):17-27.
- [15]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251-262.
- [16]王雅莉, 宋月明. 东北地区市场化差距与成因的比较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4):8-13.
- [17]王小鲁, 樊纲,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8]邓宏图, 李亚. 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的经济史解释: 1956—1996——“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与过渡性[J]. 南开经济研究. 2005(2):3-11.
- [19]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20]HUANG Y G, YANG X K. Specialization, Information and Growth:A Sequen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1999(3):257-274.
- [21]刘平. 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1):104-117.
- [22]王彦斌. 市场化过程中体制内组织的变迁与适应——一项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 S 市的调查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1(6):37-41.